

从城南走来——林海音传

(2)

夏祖丽

吴贻弓导演《城南旧事》

一般来说,孩童对于人生善恶固然需要指引,《城南旧事》里英子眼中的小偷、把亲生孩子卖了的黄板牙、做过人家姨太太的兰姨娘,还有惠安馆里的疯子,他(她)们在成人眼中各有不同个性和故事,但林海音在下笔时,却没有黑白分明、善恶立现地去评判事情,而是呈现出人在没有办法时的弱点。这样的作品,往往比伦理道德教条式的写法感人得多,也更引人深思。事实上,孩童探触人生的能力远超过成人的预期,他们往往在体验一件重大的事件后,快速成长,体会到人生的复杂与多变。林海音人就是如此,在十三岁失去父亲的那一天,她就提前长大了。

一九八三年,上海导演吴贻弓把《城南旧事》拍成了电影。当时“文革”刚结束不久,八个样板戏使人倒了几年胃口,这时一部写老北京、写古老中国人的亲切人性的电影,一下子使整个中国轰动起来。人们心想,原来我们还有过这样美好的日子啊!《城南旧事》感动了电影院中无数的观众,林海音也成了家喻户晓的台湾作家。《城南旧事》不但在中国大陆各地放映,还在世界上四十多个国家放映,得到许多国际大奖。包括:第二届马尼拉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鹰奖(一九八三年)、第七届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国际儿童电影节最佳影片奖(一九八四年)、第五届厄瓜多尔电影节最佳影片奖(一九八八年)。这部电影也获得第三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音乐作曲奖(一九八三年),导演吴贻弓获得最佳导演奖,饰演宋妈的女演员郑振瑶获得最佳女配角奖。此外,获得一九八四年度香港十大华语片奖,《文汇报》与《文汇报时报》合办的“文革”后十大最受欢迎影片之新时期十部电影奖,吴贻弓获得该活动的导演荣誉奖。

正如作家文洁若女士说的:“它使人耳目一新,仿佛是闷室里打开了一扇窗户。”旅居温哥华的中国大陆作家丁果也说:“《城南旧事》这部电影,把中国人饱受阶级斗争摧残而

冷漠的心灵暖暖地燃烧起来。在台北街头匆匆而过的人恐怕很难理解,尽管林海音女士在他们身边生活了几十年!”

导演吴贻弓表示,《城南旧事》电影的拍摄曾经过一些周折。早先,导演伊明在社科院台湾文学研究所看到了《城南旧事》这本小说,很喜欢,于是改编为剧本,想拍成电影,但一直没实现。后来伊明就将剧本交给当时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陈荒煤觉得很不错,就推荐给上海,上海电影制片厂觉得这是本好书,值得拍,就把吴贻弓找了去,吴贻弓当时刚刚开始独立导演,拍了《巴山夜雨》及《小花猫》两片,吴贻弓看了剧本后,要求看原著。看了原著后非常喜欢,表示如果要他拍,他要重新编,回归原著。后来吴贻弓重新写了一份导演工作本,为了尊重前辈,编剧仍用伊明先生的名字。

北京,国王的梦境

林语堂说过:“北京像是一个国王的梦境。”一九三六年,林语堂离开中国到美国去之前,特地再去北京一次,他认为世界上没有什么城市比北京更秀丽、更自然、更文明了。

一九九四年六月,林海音受到日本老舍研究会藤井荣三、中山时子等教授的邀请,到日本关西大学该会年会上演讲《城南旧事》里的旧北京。林海音告诉与会的人,她心目中的北京三宗宝是:“城墙、天桥、四合院;骆驼祥子满街跑”。《骆驼祥子》是极熟悉北京民俗风情的作家老舍以北京为背景所写的名著,也是林海音很喜欢的一部小说。老舍的另外一些书《四世同堂》、《离婚》、《老张的哲学》也都是以北京为背景。马森教授曾把老舍笔下的北京和《城南旧事》里的北京做过比较,他表示老舍把北京的大街小巷、春夏秋冬、达官贵人、地痞流氓、教员学生、贩夫走卒差不多都写遍了,老舍对北京所知之深、所见之广,恐怕没有任何一个作家可以与之相比了。但是老舍偏偏没有看到林海音所看的、没有写到林海音所写的。林海音是从一个小女孩的眼光来看北京,她的视野、见地和情感,与成人

的老舍大不相同。如果说老舍有关北京的小说是社会性的、批评性的和分析性的,林海音的《城南旧事》则是个人的、感情的、综合的。

林海音通过英子的眼睛把北京城南的风光穿插其间,给全书一种诗意。评论家认为,那座城和那个时代变成一种亲切、包容的角色,《城南旧事》若脱离了这样的时空观念,就无法留下永恒的价值了。

中国自古以来才子出江南,北京虽是座文化古都,但北京的文学家却不多,像写北京的丁西林、老舍、曹禺、张恨水、萧乾,甚至林海音,原籍都不是北京。老舍的儿子舒乙一九九九年年初在北京接受访问时表示,当年的北京人穷人占的比重较大,差不多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穷人。老舍是个穷人,他写的也是穷人。他说:“《红楼梦》写的是北京上层阶级的大家庭,曹雪芹了解那个时代、那个阶层人的生活,因此《红楼梦》出了彩。《骆驼祥子》写的是北京下层阶级,那样一个劳苦大众的人力车夫,因为老舍了解他们,写得好,所以也出了彩。而林海音先生是从中产阶级的角度来写北京人的生活。她在这个层面里得到比较充分的反应,就上来说,可以观察自己的父亲,也就是知识分子;就下来说,可以观察老妈子、农民、小偷。所以她往上也能够一够,往下也能够一够,眼界比较宽阔,取材也比较广泛。这个阶层的北京在文学上原来是空白,因此《城南旧事》这本书在文学上有一定的分量、地位和价值,毕竟这个角度很重要。《城南旧事》保留了那个阶层北京的生活风貌,而且它里头的民俗部分也很重,这使她的作品有很大的乡土气,乡土气是林先生作品中很重要的气氛,有一种味道,看她的东西能闻出那种味儿。”

北京外语学院教授、语言学家夏祖焯表示,在老舍写了《四世同堂》以及曹禺写了《北京人》之后,这个中间是一段空白,这时突然有一个不带政治性、不喊口号,讲北京市民生活的《城南旧事》出来。而《城南旧事》里写了很多老舍与曹禺想写而未写的人物,像疯子、老妈子、小英子等。他说:“你一想到英子住的

晋江会馆,就会想到旁边也许可能有一个洋车厂,而这洋车厂里,很可能骆驼祥子就在那儿拉车。从晋江会馆往南走,那可能就是《骆驼祥子》小福子上吊的树林。林海音的《城南旧事》把这些都串起来了,所以为什么当时大陆上许多人读了这本小说很感动,因为它很真实,更难得的是它保存了那个时代的语言非常质朴、非常透明,又非常道地的北京话它就是当时穿白布褂儿、黑裙子,在街上走的中学、小学女生说的话。人说语言大师、语言专家的,其实林海音才是语言大师,她的语言精练、纯朴而平易近人。今天北京胡同里学生间的怪话很多,现在的语言在变。但《城南旧事》里保留了那个时代、那个阶层人的语言,这点很重要。”

作家铁凝也为《城南旧事》叙述语言的质朴、简洁和温暖的幽默感动。她说:“文笔细腻清秀或真挚热烈都不困难,但幽默却是最高形式,我喜爱林海音这也是一个重要缘由。”

作家萧乾晚年曾与妻子文洁若合作翻译了《尤利西斯》(Ulysses, 1922)这部巨作。一九九九年文洁若女士在萧乾先生故世后在北京寓所接受访问时表示,《尤利西斯》的作者乔伊斯(James Joyce),二十二岁就离开他的家乡爱尔兰都柏林,在法国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埋骨瑞士,终身都没再回过爱尔兰,但他毕生写作却以他二十二岁之前居住的故土为主。因此有人说,倘若都柏林从地球上消失了,仍能根据乔伊斯的代表作《尤利西斯》来重建这座城市;爱尔兰、法国、瑞士都以“拥有”乔伊斯为荣,不管他的作品写的是什么地方。而林海音远离她住了二十多个春秋的北京,在台湾怀着深切的思念之情,描绘出一幅幅古老北京的民俗画和风景图。文洁若说:“爱尔兰人注意保存古迹,近一个世纪来,都柏林的变化不大,可是北京城,已经变得面目皆非了。要想重温一下这座文化古都的风貌,还真得读《城南旧事》呢!”

正如台湾诗人余光中说的:“上海是张爱玲的,北京是林海音的。”

与邬达克同时代

王唯铭

9.上海市民居住的石库门

现在让我们进入上海普通市民居住的石库门,进入这种建筑的深部空间。我在“殖民地风格与简屋”的那节文字中曾经说过,因小刀会的骚乱、太平天国的暴力,在江南一带曾经有过大规模的难民潮,难民潮之汹涌、之澎湃,是完全地冲垮了当年上海道台设置的“华洋分居”的藩篱,与此同时,为了迅速地安顿来自长三角的男女难民,租界当局推出了大批简屋,这种简屋,你可以将它看作未来上海最重要的民居之一石库门的雏形。稍后,当租界工部局出于安全因素将简屋拆除一空,石库门建筑便在简屋地基上正式亮相。

那么,对石库门建筑最正确的描述又是什么?通常来说,石库门建筑的高度一般为二层,平面的设置与中国传统的江南民居成分,却显而易见地借鉴了西方联立式住宅布局方式。石库门的两扇黑漆厚木大门一般宽为1.4米,高约2.8米,门的四周通常用花岗石或宁波红石(砂岩)做一个门框(石库门一说由此生发),门头上砌三角形、长方形或半圆形凹凸花纹,大门上有一副铜环或铁环。由于这种住宅比四合院占地省,又比欧美式洋房造价低,一经问世于英租界,便很快地流传于上海老城厢内外及近郊一带,以致遍布全市。

历史中最早记载的石库门里弄,系1852年建造在宝善街(今广东路)的公顺里。

建筑史专家们确认,从19世纪70年代起,上海的石库门建筑较为著名的有洪德里、棉阳里、吉祥里、敦仁里、兆福里,它们全都可以算作第一代石库门,这个时期从19世纪70年代一直绵延到了20世纪10年。

1910年之后,上海的石库门建筑进入第二代,也即所谓的后期石库门时期。

与第一代石库门相比,后期石库门在总体布置、单体设计以及建筑的细部装饰方面都有大的变化和改进,上海建筑史专家对此如此评述:后期石库门的排列比早期石库门更加整齐,同时弄堂也有了加宽,由以前的4



米扩展到了5米。单体设计则由原来的三开间二厢房变化为单开间一厢房或双开间一厢房。建筑的细部,譬如栏杆、门窗、扶梯、柱头、发券等,全部采用西方建筑细部装饰的处理手法,屋面沿口安装了白铁落水管。

在上海,后期石库门典型的有宝康里、大庆里、珠联里、渔阳里、斯文里以及老会乐里。说到老会乐里,这里应该多讲几句。老会乐里这里本是萧索、荒凉的田野之地,后来来自南浔的大富商刘景德,在1944年买下这儿的地皮,翻建后的里弄被称为会乐里。

1913年,随着公共租界将泥城浜彻底填埋,随着上海不断地辟筑起新马路,西藏中路终于应运而生。

在越过了1918年之后,再下一个20年中,当上海的现代性在中国东部这个区域得到进一步的体现,石库门建筑同时进入了它的黄金时代,第三代石库门应运而生了。那个时期,石库门再次发生了变化,垂直向上,由早前的二层上升到了三层,外立面的处理与以前也有了更多不同,西方装饰艺术派的细节比比皆是,尤为重要的是,有了抽水马桶,这使得上海市民的生活质量得到一个质的提升,或许苦力黄阿根永无可能享受这一次的西方物质文明,但不断扩展开来的上海中产阶级却是感同身受。

1923年,在法租界的勒非德路与贝勒路相交地,有两个兄弟共同投资建造的第三代石库门里弄伫立于此,共有两条里弄,一为梅兰坊,一为瑞华坊,它们全都符合第三代石库门的特征,不仅高达三层,清水红砖,古典趣味的立面装饰,内部空间中,又全都装备着抽水马桶。为此,你若想租在梅兰坊,不拿出四根小黄鱼便成了一件绝不可能的事情。瑞华坊档次稍微下降一点,但居住于此的都是民国时期生活相对优裕的男女,其中包括一些越剧名角。还必须说明的是,促使这种建筑空间在上海大量产生的根本原因并非某个天才建筑师的审美理念,追本溯源,它的诞生应该归功于以巴富尔们为代表的西方政治势力在19世纪中期对上海的楔入,以及伴随着这种政治势力一同来到上海的西方文化对这块地域的反复浸淫。还要加上西方各大洋行,它们的介入和推动,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8.从容应对

上午,周松明在办公室整理资料,手机铃声响起。“喂……我是周松明,你是谁……噢、噢,林燕……老同学,你有什么事相告……有事找我谈?你来酒店吧……不方便?是不想碰到我。你俩怎么了……我知道了,这样吧,找一个可以谈话地方等我……好的,就在我母亲家旁边的茶室……我三刻钟后肯定到,再见!”

周松明到了那家茶室,找到了林燕,两人喝着茶,开始了谈话。“不好意思,你这么忙,还叫你出来……”林燕想了一想说,话里带有歉意。“老同学之间,不用客气……我就是再忙,也不能拒绝。”周松明认真地回答后问,“什么事让你烦心?你快说吧。”

林燕问:“姓黄的是否与沈红珍一起要出国?”“有这一回事……你吃醋啦?”“哼!我有必要吗?老实跟你说……我现在是庆幸。”林燕见周松明似乎有点吃惊的样子,接着说,“姓黄的赤佬,我早晚要跟他拜拜……如果这次出国两人真的搭上了……那我就下决定了,彻底分手……这样我也解放了。”说完她还轻松地笑了笑。

周松明听了有些纳闷,凭黄玄兴与林燕组成的这个家庭,应该在经济上已经早超越了小康水平、容貌上这算是可以互补、文化上又都是大学毕业,这种家庭应该在东海的市面上也是很响亮的……想不到林燕的一番话,透露出来的情绪,却充满着敌意,把离开黄玄兴当作一种人生解脱。由此看来两人已经到了一种不可调和的地步。黄玄兴的花心是有点名气的,在酒店里稍有点姿色的女人,一般都不敢与他接近……如今林燕觉醒了,要离开这个男人,也许就会释放心理负担……但问题是家里还有一个男孩,今后还要继续生活,如果单身的话,难道就能幸福吗?莫非在她隐私的天地里,也有了意中的人。

周松明凝视着林燕,见她陷入思考,喝了一口茶,平静地说:“林燕,你现在的心境,我完全能理解……关于你俩的婚姻,我作为外

人,没有必要多费口舌,但作为老同学,我还得问你:你离开他,一切都准备好了吗?”“谢谢你的关心,我的回答是:准备好了。”林燕十分坚定地回答。

周松明不给林燕思付的时间,接着又问:“那我要冒昧地再问一句,你是否外面也有人?”料想不到,林燕爽快地答道:“是的,我也有了……”“有了”,这种回答是多么干脆、多么自信呀。

林燕捋了捋鬚发说:“分居以后,我去过北京旅游,见到我大学的老师。他跟我说,他弟弟也在东海工作,离婚多年,一个人生活,很孤独很寂寞,要我有时间的话,多关心一下……”

“关心一下……你们就对上号了。”林燕只是稍微点点头,“今天我就是受他的托付约你出来的……”“他是谁,与我有什么关系?”周松明探问起来。

“当然和你有关系……否则我不会这样对你坦白自己的事。他是一个建筑工程专家……据他说,参加了市里组织的华贵大酒店……扩建工程的决策调研工作。最近有个姓黄的人,一直在骚扰他,几乎天天给他电话,不是邀请赴宴,就是要上门送礼,他都拒绝了,搞得心里好烦好烦……尤其是这两天,他发现上下班好像总有人在盯梢……他在上次会议上见过你……当得知你是我老同学,要我转告你:应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来阻止他们非规则的手法,争取你们的方案顺利通过。”

林燕今天把周松明单独叫出来,就是为了这件重要的事。

“非常感谢你的提醒,我会采取相应的对策……你也要安排好今后的生活,愿你幸福欢乐。”周松明表示了自己的感激,然后把话题转到她儿子今后的教育问题上。

周松明对黄玄兴的所作所为,有点不屑一顾。那种采用非规则的手段,来达到个人目的的做法,显得十分可笑。有时也许会蒙蔽一些人,但决不会泯灭其他人的良知,阻碍人们对善良与正义的追求。他始终相信,只要立足点是为了社会大众和城市繁荣,自己的方案一定能得到大多数专家肯定。

石库门酒店

范潮龙

